缅怀追思

# 怀念同窗挚友李鸿彬教授

秦宝琦

鸿彬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，但是，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，往日同他促膝谈心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我和鸿彬可谓有缘，我们不仅是大学同学，而且是始终在一起工作的挚友和同事。

1955 年，我和鸿彬一同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，同在“历史系 55 级一班”学习。当时北大发展的规模，大大超出了原有设备所承受的能力，造成学生宿舍严重不足，最初我们数百名男生，全部集中住在一座刚刚落成的饭厅里，而且都是上下铺。后来条件虽有所改善，但全年级男生八十多人，仍然住在被称为“十四斋”的学生大宿舍。这是一座两层的小楼，我们一班的二十多名男生，住在一个大房间里，仅用半截苇箔墙分隔为三个单元，大家可谓朝夕相处。

鸿彬在大学学习期间，十分热心于班上的社会工作，曾主动要求担任全班的生活班长，热情为大家服务。由于他为人忠厚、正派，因此在班上有很好的人缘，同学们都愿意同他接近和交往。在专业学习方面，他更是勤奋刻苦，尽管当时政治运动频仍，而且“白专道路”的帽子满天飞，许多同学因为怕被戴上“走白专道路”的帽子而不敢学习专业知识，而他却能够坚持专业学习，这在当时要承受很大的压力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1960 年从北大毕业后，我们又一同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。最初，我们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分来人大的五位男同学，被安排在同一间宿舍。大家在生活上彼此关心，学业上相互砥砺，相处得格外亲密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在各自成家以后，彼此仍然经常在一起谈心、交流，即使在“文革”期间我和鸿彬分属不同的派别，而我们之间的友情却丝毫未受到影响，这在当时尚属罕见。1970 年末，我们同往江西余江县的人大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在人大被“四人帮”强行解散后，我们又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清史研究小组。1978 年人民大学复校，我们成为清史研究所最早的成员。几十年来，虽然经过多次人事调动和机构的重新组合，而我和鸿彬却始终没有分开，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挚友的重要原因。

鸿彬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，一直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。他对我们党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，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后，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，因此较早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在业务工作方面，鸿彬多年来始终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。在中国历史教研室早期工作期间，他不仅担任教学工作，而且兼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处的工作，在吴晗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言传身教下，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迅速提高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清史研究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，鸿彬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清史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，他牵头整理、出版了《清入关前史料选辑》（三册），为清入关前满族史和清史的研究工作，提供了方便条件。为了给清史研究工作者创造一个成果发表的园地，他又积极参加了《清史研究通讯》的创办和编辑工作。后来《清史研究通讯》改版为《清史研究》，鸿彬更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，多年担任《清史研究》杂志

的主编，为《清史研究》这一学术刊物的成长、发展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由于常年超负荷地工作，使鸿彬的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损害，终于积劳成疾。在同病魔的斗争中，他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，即使在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，他却仍然坚持指导研究生和自己的科研工作。他以坚实、渊博的知识和诲人不卷的精神，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尊敬。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他竟然在重病之中，还完成了一部专著《清朝开国史略》。这是鸿彬几十年教学和科研成果的结晶，一经问世，便得到学术界的好评，被誉为有关清史“教研结合，求实创新”的力作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曾邀请北京大学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及本所的专家学者，为该书的出版，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进行研讨。与会学者对这部专著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是一部“传世的好书”，北大和中央民族大学相关专业还把该书指定为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。1999 年 3 月，该书荣获“北京市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”一等奖。有关书评指出，该著作“透彻地揭示出清朝开国史所包含的历史哲理，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精神的途径”，并鲜明地体现了作者“求实创新的精神”。如在努尔哈赤的祖籍、死因问题；皇太极继嗣问题；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问题，以及满族源流、建元称汗、宁远之战、丁卯之役、松锦决战等问题的研究上，都颇有新意。

鸿彬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我国高等教育战线辛勤耕耘，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清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，成为我国清史学界的知名专家。他在清代政治史、军事史、满族史，特别是清朝开国史等方面，研究有素，成绩斐然，除公开出版的专著《清朝开国史略》外，还参加过《简明清史》的撰稿工作，兼任过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》中国古代战争史元明清卷的学科顾问和撰稿人，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，赢得学术界同行的称赞。他除担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外，还兼任《清史研究》杂志主编、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满学会副会长。

鸿彬学术上的成就，可以说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，作为他的同龄人，我深有体会。鸿彬从 1960 年毕业后，到 1978 年提工资以前，夫妇两人一直靠 112 元人民币维持生活。在 17 年漫长的岁月里，他们依靠这点微薄的收入，上要供养年迈的父母，下要哺育年幼的子女。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，为了教学和研究工作，他仍然挤出生活费购置专业图书资料。在长达十多年的日子里，全家四口人饱受住房缺乏的煎熬，他们夫妇都是大学教师，需要晚上备课、研究，为了照顾孩子们的学习，它们常常不得不在孩子入睡后在深夜才开始工作。

作为鸿彬的同窗挚友和同事，我深深地怀念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，对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治学态度和勤恳的敬业精神，以及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的高尚品格，感到由衷的敬佩。对他过早地离开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清史研究事业而惋惜，更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朋友、好同事而不胜悲伤。

鸿彬一个尚未实现的夙愿，就是期盼我国历史学界能够早日启动由周总理、董老提出，并得到毛泽东、邓小平同志关怀的大型《清史》撰修工作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最近我国著名清史专家戴逸、李文海教授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，邀请全国著名清史专家，已于今春召开“纂修大型清史研讨会”，使全国历史学界盼望多年的大型《清史》的纂修工作有望启动，鸿彬有关撰写大型《清史》的夙愿，终于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，如果鸿彬地下有知，也会得到慰藉了。

值此鸿彬逝世一周年之际，特撰此文，借以寄托哀思。